

四千四百种善本书的详细著录和考订

——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介绍

萧 均

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王重民先生著。1983年8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王重民先生（1903—1975）是我国著名的目录版本学专家之一，北京大学教授。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，历任编纂委员索引组长、研究部主任等职，解放后并短期代行馆长职务。他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整理敦煌卷子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中国善本书目，发表过有关目录学的论文专著多种。

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编写在1939至1949年间，是他经眼的善本书的记录和考订。其中所著录的善本书，是收藏在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凡四千四百余种，绝大多数是明刻本，另外有六朝、唐写本和宋刻本六十余种，金、元刻本一百余种，影抄宋元刻本以及明抄本一百五十余种，明末朱墨印本一百余种。还有少数的清初刻本。（最近得知，在王重民先生的遗稿中，发见有善本书提要稿七百余篇，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史部书籍的提要，还有几篇子部书的提要，现正在整理中，一俟整理竣事，拟编为本书的补编。）

这部书包括下列的几个部分：

一、提要 and 提要补遗 补遗是在核对提要时，发现在成书之外的遗稿，凡百三十余篇。

二、中国善本书题跋 这些题跋是在编写提要时所写的，因为写过题跋的就不再写提要，所以汇集在一起作为本书的附录，以补提要所未及，凡二十七篇。

三、索引 附录索引四种：计有书名索引，撰校刊刻人名索引，刻工人名索引、刻书铺号索引。以供使用本书的人便于检索。

这部书是王重民先生毕生辛勤劳动的结晶，是他的主要学术著作之一，重点在各书的版本记述和考订，所以对每部书的特征，都详实的记录出来，同时，对版本之源流，作者之情况，及各书研究之价值等，都一一的写在提要里面。

以下试从对每书特征的记录和内容考订这两个方面，举出一些例子，来说明本书的情况，和王先生的研究成果。用以作为对本书的介绍。

一部书之所以定为善本或通行本，二者必需加以比较，指出其不同之点在那些地方。所以要把判别刊本的各种情形，都要如实的记录出来，如书名，卷数，是全书还残本，编撰者和校刊者的姓名籍贯，行款若干，字数多少，刊刻年代，印刷用纸，板框的上下大小，批校者的题跋校记，刻书的牌记，原书刊刻的序跋，藏书家的印章，重要刻工的姓名等，这些都是判别版本的重要依据。以上这些项目，本书均按照一般惯例著录外，对于板框的大小，原书的序跋，批校者的题记这几个项目，比起其他善本书目，都特别加以详细记载，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。

本书将刻本的第一卷第一页的板框大小，都量出数据来，以厘米为单位，记录在行款的后边。为什么对于板框的大小特别加以详细记录呢？因为古代雕板书，绝大多数都有板框，其高低大小，翻刻本与旧雕本，则常有差别。如仅照旧本翻刻，其差别一般较小，然不论大小，差别一定是有的，如：

《汉隶字源》五卷《碑目二卷》，宋刻本版框为 24.2×15.7 ；汲古阁翻刻宋本版框为 23.7×16 。

《吕氏春秋》二十六卷，元至正年间刻本，十行二十字，版框为 22×14.7 ；明张登云翻刻本，亦十行二十字，版框为 22.1×14.6 。

不仅翻刻旧本如此，即翻刻时代相距不远的刻本，其版框亦多有差别，如：

《明伦大典》二十四卷，明嘉靖年刻本为八行十八字，版框为 26×17 ；外省翻刻本亦八行十八字，而版框稍小，为 24.3×16.6 。

《大明会典》二百二十八卷，明万历年司礼监刻本为十行二十字，版框为 23.8×16.15 ；外省翻刻本亦十行二十字，版框为 22.2×13.9 。

《古今律历考》七十二卷，明万历二十八年陕西省原刻本为九行十八字，版框为 20.7×13.6 ；万历三十七年以后保定翻刻本，亦九行十八字，版框为 20.8×13.7 。

至于重刻本，其行款不论相同与否，其版框则均有差异。如：

《皇明疏议辑略》三十七卷，明嘉靖年原刻本为十行二十二字，版框为 17.3×12.6 ；万历年王叔泉重刻本行款相同，版框为 18.6×14.2 。

《性理大全书》七十卷，明司礼监刻本为十行二十二字，版框为 25.5×16.8 ；明嘉靖间刻本为十一行二十六字，版框为 16.8×12.3 ；明万历年刻本为十行二十字，版框为 21×13.8 ；万历年师古斋刻本亦十行二十字，版框为 8.2×5.5 ；翻师古斋刻本版框为 7.9×5.5 ；明末刘莲台安正堂重刻本为十一行二十六字，版框为 6.4×4.8 。

从以上所举的一些子，可以说明版框对于版本的鉴别，有着重要的关系，详细记录是必要的。

序跋也是辨别古书刻本的主要条件之一，所以本书对于每种书的序、跋皆录其作者姓氏及写作年月。因为古籍流传既久，有的序跋佚失，有的被书估有意删去，用以冒充旧本，这样往往会在刊刻的年代上，发生错误的著录，如张之象在万历年间刊刻的《文心雕龙》十卷，有万历七年张之象的序文，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所据的本子因缺少这篇序，便误题为嘉靖年的刻本。又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二十四卷，有弘治七年庸愚子序和嘉靖元年修髯子序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本适缺嘉靖元年序文，故误以嘉靖本题为弘治本。

一书的翻刻本，也往往会增刻新的序文，如邢云璐的《古今律历考》七十二卷，有陕西的原刻本和保定的翻刻本，以两本对校，方能稍窥其笔画之异和翻印之精。如果序跋俱在，从序跋上便容易区分了，因为翻刻本增加了万历三十五年朱之蕃序，万历三十六年孙玮序和孙承宗的序。

本书对于重要序跋，往往录其全文，或在提要摘录其主要部分。从本书所录的序跋来看，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情况所定的。一种是没有刻本的抄本书，其序跋一般都是照录，因为抄本书是一般读者不易见到，从序跋可以了解其梗概，如清张能麟著的《孝经衍义》四十七卷，存有抄本，是书不见他书著录，所以录其《进孝经衍义表》、《进孝经衍义札子》、《孝经衍义后序》和《孝经衍义目录》等。清和宁所撰《热河志略》二卷，存有抄本，是书无刻本，录其自序。清袁学澜所著《吴郡岁华纪丽》十二卷，这书是孤本，仅有袁氏适园抄本，录其《自序》与《例言》。一种情况是旧刻本和旧抄本上的序跋，如为通行本所缺，录其全文，以补通行本之缺。如万历年刻本的《咸宾录》八卷，有万历辛卯刘一焜的序文，通行的《豫章丛书》本反缺其序，因而照录；明抄本许洞著《虎铃经》二十卷，有《虎铃经后序》，通行的明刻本和清刻本均缺，亦录其原文。另外一种情况是，书虽有刻本，而原书流传极罕，如

明末郑大郁编订的《经国雄略》四十八卷，为明弘光间刻本，传本极少，有郑芝龙的序，所以也照样移录，以供参考。还有一种特别情况，是为了作为辨伪举例之用的，也录其序文，如明抄本《圣宋景祐乾象新书》二十卷，现已考出它是一部伪书，并且考出它是把《观象玩占》一书改头换面而成，也录其序表，重民先生之言曰：“兹录诸伪序表，及阎百诗题记于后，俾知近代藏书家嗜古成风之后，伪作古书者随即产生，…所以附载此等极无价值之文件，意在为辨伪者举例也。”

本书所著录的各种书，往往有藏书者的题记，这些题记多是叙述该书流传的源流，得书的经过，以及与他本字句之异同等，可供研究者之参考。所以这些题记，都抄附于提要之后。有的题记已经辑为专书，由于字句间有异同，也照录以供校勘本之用。那些过录前人的题记，只在提要内加以说明，不一定再行移录。

以下介绍本书对内容考订的情况。

本书对著录各书的内容考订，涉及的方面很多，有的是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订正，有的是对于伪书的考辨，有的是对于刻书时代的考证，有的是纠正前人对于撰人的误记，有的是论复刻本与原刻本之差异等。这些考证和论断，都是重民先生的渊博知识、丰富经验和辛勤劳动的具体表现。现在也举一些例子来说明。

本书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中已作提要者，即不再详作，《四库总目》无提要者，则方另编写。《四库总目》如有错误或未完善者，则加以辨证或补充。本书对《四库总目》辨证或补充的地方很多，有的正书名之误，有的正卷数之误，有的正种数计算之误，有的正撰人和编校人之误，有的正四库馆臣论断之误，其例甚多。现在只举两个例子，一为馆臣误认《历代通鉴纂要》即《少微通鉴节要》，一为馆臣误认《春秋左传》的杜林合注始编于王道焜。按《历代通鉴纂要》九十二卷，明李东阳奉敕撰，《少微资治通鉴节要》五十卷，旧说为宋江贇撰，此本是判然

二书，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：“《纂要》即《节要》，盖史偶异文，”重民先生为了证明《四库总目》之误，在《历代通鉴纂要》的提要里，据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一百九十九，《明武宗实录》卷二十七、二十八，录其纂修文献；又在《新刊古本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》的提要里，录宋嘉熙丁酉江铨序，因为江铨序文是阐述此书源流的最早史料。用这些资料来证明这两书是判然两书是有力的。又如《四库总目》经部春秋类谓：《左传杜林合注》五十卷，明王道焜、赵如源同编。王道焜杭州人，中天启辛酉乡试，与里人赵如源浚之，共辑此书云云。重民先生以嘉靖年刊杜预、林尧叟注之《春秋左传》证明此书确实不始于道焜，谓“此本卷末有‘巡按四川监察御史朱廷立案行，成都府知府杨铨校刊’牌记，铨丰城人，正德九年进士，廷立通山人，嘉靖二年进士，则此本刻于嘉靖初，前于道焜者盖百余年”。又据元刻本林尧叟注《春秋左氏句解》，说明林尧叟全依杜预以作句解，疑合并之事，林氏自为之者。林氏原本不题杜预名，明人翻刻其书，始冠杜名于林尧叟前，此杜、林合注之名所由来也。

关于伪书考辨的例子 明抄本《圣宋景祐乾象新书》三十卷附拾遗不分卷，原题司天春官正权杨维德奉敕撰，目录后题嘉靖丙午六月十二日五川居士万卷楼记，卷内有季振宜等名家印记，卷端有阎百诗题跋一则，又有朱笔过录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一则，蓝笔过录《崇文总目》一则。重民先生在提要里说：“及余详检是书，始知虽是明抄，虽有著名藏书家印记累累，实是伪书，非宋代之《景祐乾象新书》也。”证之以书内所题宋仁宗庙号，定其为伪书，谓“卷端所载嘉祐四年国史院及杨惟德进表，皆仁宗庙号，仁宗卒于嘉祐八年，景祐间焉能知其庙号？”证之以序内所涉及的著作，定其为伪书，谓：“御制序署景祐四年十月，而御制序云，以继《渔樵问答》、《渔樵问答》今谓为邵雍所撰，或云在其后，景祐四年雍方三十余岁，《渔樵

问答》尚未成书，何有以继之可云？”证之以误题衔名，定其为伪书，谓：“正权不似人名，钱天树所藏真本《乾象新书》，其印版衔名如周淙为兼司天中官正权同管勾司天监公事，又《灵台秘苑》衔名，丁洵为天中官臣权判司天监，正乃正副之正，权有暂时之义，作伪者误作人名，尤为可笑。后检《观象玩占》，内容全同，乃更恍然其为就《玩占》改头换面而成。”又明抄本《萍州可谈》三卷，宋朱彧撰，卷端有朱彧无惑自序。卷内有昆山徐氏藏书、徐乾学印，‘汪印士钟’、‘三十五峰园主人’等印记。以自序所提及的年代，证其为伪书，谓：“按自序云：‘嘉祐五年余解绍倅归。’考《宋史》卷三百四十七，无惑父服，熙宁间始成进士，则嘉祐五年，服仅二十上下，无惑或尚未出世，焉得有解绍倅归之事？”以书中记事之时间过长，证其为伪书，谓：“及检阅全书，如记李易安卒后事，则又觉太晚，（自嘉祐五年至易安之卒，约近百年。）而最末一条，记宝祐四年事，自著书至记事所止，相距约二百年，为必无可能之事，遂不得不疑其伪作矣”。校之其他版本，无一条相同者，证其为伪书，谓：“此本三卷，凡九十四条，持校《百川学海》及《眉公秘笈》明以前旧本，（凡五十余条）无一同者；又校以《学津讨原》所刻四库校《永乐大典》本，（凡百五十余条）亦无一同者。”以序文及书中所涉及人的事迹，证其为伪书，谓：“序又云：丞相尧夫，建节瓯闽，得承教言，盖为卷内‘谢安折履齿’条有‘范尧夫甚怒之一语而发，然尧夫未尝贬闽，而无惑亦无居瓯之事。”以不知萍州为朱彧之自号而误解为地名，而证其为伪书，谓：“如序云：嘉祐五年，余解绍倅归，避地剑南之汶山，有园池之胜，每暮春风和，萍藻满塘，天光在阙，鱼鳧入栏，欣然乐之。盖欲以释萍州之义，殊不知萍州乃无惑所自号，即有其地亦不在蜀而在楚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一云：《萍州可谈》三卷，吴兴朱彧无惑撰，宣和元年序。萍州老圃其自号也，在黄州，盖其侨寓之地，事见《齐安

志》。然则其书成于宣和元年，陈振孙所见，定为原本真序。”由此可见，作伪者之伎俩，不过尔尔。细心的读者，自能辨之。

对于刻书时代的考证 《括苍二子》六卷，系合刘基《郁离子》和叶子奇《草木子》二书，有的书目题为明正德年刻本。按卷端刻有括苍二子序云：‘二先生之书，今学士大夫多能言之，而合梓以传者，则罗源令杨君意也’谓此合刻为杨君之意。卷内题：‘郡后学文林郎杨瑞校梓’则杨君名瑞。考《丽水县志》云：‘瑞字汝贤，处州卫人，博通经史，以岁贡授罗源令，在任六年，贤声茂著。’又考《罗源县志》，瑞知县事在万历三年，则知是书盖刻于闽，时为万历三年与九年之间也。这是考证校刻人的时代以定刻书时代的例子。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五十卷，宋欧阳修撰，卷内题临江后学鲁得之考异。有的书目题为明永乐年刻本。按此本危素记后及他卷末题‘时柔兆摄提格县人陈斐允章校勘刊谬’。考《永丰县志·选举志》永乐间诸贡有陈斐、北坊人，则其刻书之丙寅，似为正统十一年，非洪武十九年也。何也？《县志》列陈斐于周宁后，宁永乐二十一年举人，设斐贡于永乐十五年，上距洪武丙寅为三十一年，下距正统丙寅为二十九年，则洪武丙寅，斐年尚幼，或竟未降生，恐不能刻书也。所以定此书为正统间刻本。这是考定校勘刊谬人的时代以定刻书时代的例子。《吴状元荣进集》三卷，原题‘明开科第一状元吴伯宗著，族裔孙吴兆璧辑，后学傅文兆校，金陵后学周文华梓’。诸家著录，均题为嘉靖刻，盖均因卷端嘉靖二十三年黄直序致误。此本题吴兆璧辑，考《金溪县志》卷二十八有兆璧传云，字子毅，万历乙酉、辛卯、甲午三科副榜，授南昌府训导，甲午为万历二十三年，上距黄直序已五十年。又此本黄直题名后有题记，称‘至穆宗皇帝即位’云云，则即不知兆璧年代，而题记称为穆宗谥，亦可知为万历年间付梓者矣。这是考证编辑人时代，而不能仅据序文以定刻书年代的例子。又鲁铎的《鲁文恪公集》，因为有

隆庆元年的方恪跋，有的书目定为隆庆年刻本，但是辑者李维楨在隆庆元年年未及艾，其序文似作于成名之后，不能仅据方序定为隆庆年刻本，而应定此本为万历年间重刻本。《区太史诗集》二十七卷，明区大相著，有的书目题为崇禎刻本，“盖据陈子壮序，余则以校字不讳而玄字反缺笔疑之，故为之说曰：校字不讳而玄字反缺笔，盖原刻于天启以前也；陈子壮序当作于大相二子为父表墓印集之时，谓为二子所刻者，明人之陋习也；又玄字间有不讳者，得知玄字末笔为康熙间所铲去，卷内补叶，盖有刻于崇禎间者，有刻于康熙间者，此本则康熙间所印者”。这是考证书中讳字以定刊刻时代的例子。

纠正前人对于撰人误记的例子 据较早刻本以证后来刻本误题撰人，如万历年所刻《庄子翼》附有《阙误》，有题记云：

“陈碧虚《南华章句》附《阙误》一卷，具载古今本同异，今附之卷末，庶几孔氏误文之意云。”是焦氏所附，固陈氏《阙误》原书也，但《函海》本《庄子翼》所附《阙误》，题杨慎撰，《金陵丛书》本同，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六有杨慎《庄子阙误》一卷，是在李调元以前已经误题如此了。根据书的内容正撰人时代之误的，如《行军须知》，明刻《武经总要》附之，盖明人附刻于后者。卢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载之，称不知撰人，盖以为元人所作也。“兹按《安营篇》云：‘今西北银、夏、麟、府、鄜、延、环、庆、泾、原、秦、凤，地接陇蜀，南北数千里，地无百里之平。置营多在广原大陇高阪之地，或尖斜，或屈曲，或斜披大山，或临深涧，就其地形地坂，递互相掩，人马咫尺不相见，可以登高视之，远见人马，易为设备。’又云：‘近者依智高，亦使壮士沿山穿道，中有砍乱营寨溃散人马。’则当撰于北宋仁宗或神宗之世，时西北有事于西夏，西南则有事于依智高，故举以为例，盖皆著者之经验良言也。”有以两本相校，而证明原题撰人之误的，如明万历年刻本《食物本草》十卷，题元东垣李杲编

辑，明吴郡钱允治校订。“观书中屡引东垣说，则非杲撰甚明。水类‘千里水’一条，称昔浚州城中，忽一日马死数百’。检《格致丛书》本作‘昔年余在浚州’，疑作者为苏、杭人而官于浚州。允治稍有学问，知李杲未当去浚州，既托之于杲，遂改‘昔年余在浚州’为‘昔浚州城中’，而不与旧本校勘，即能发其覆也。”

论复刻本与原刻本之差异 相台岳氏刻本《周礼》提要云：《周礼》，明嘉靖年有翻岳本，今已据观古堂藏本影入《四部丛刊》、《郎园读书志》卷一有跋，论翻岳本胜于嘉靖间仿宋本，叶氏未见岳氏原本，不知翻宋本犹多误字也。明嘉靖间苏州翻宋之风颇胜，不但行款字画仍旧，刻工姓氏亦仍旧，其意甚善，其法合于科学，然大字易翻，因影写上版，大字易辨，可无误，小注不易辨识，遂不免形似之误矣。此影翻之通病也。兹更以此卷明之，页十下春人注，抒、白也，翻本白误曰；页十八上‘使之相受’注，故书受为授，杜子春云，当为受，谓民移徙，翻本徙误徙。页二十上注，谓主断刑之官，翻本主误王，页二十三下注，九夫所治之田也，翻本治误冶，页二十六下音义、蠹、桃报反，翻本桃误挑；页二十八上鞬，九勇反，翻本鞬误鞞，页三十五下鼓人注，教击鼓者大小之数，翻本击误系，所误皆因形似也。”又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文一卷，唐李汉编、宋朱熹考异，王伯大音释。有元明间翻刻王宗玉本，校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元刻本，其翻本误字多在注中，显因注文字小，刻工影刻，以意猜之，遂多相似之误。其误字之例兹从略。

根据以上所举的一些例子，足见本书提要内容之一般，其余涉及书史、雕版史、印刷史、校勘史、刻书制度、刻书风气，以及通俗读物、儿童读物，亦多有论述，这里就不一一再举例了。

书末附有书名索引、撰校刊刻人名索引、刻工人名索引、刻

出铺号索引等，这不仅对于使用本书的人予以便于检索之用，就是对于古籍编目工作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，也提供了很多方便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，这里就不用再作什么说明了罢？

来 函 照 登

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：

近读贵刊第十四辑吴茂燊、黄国声两先生撰《陈澧东塾读书记未刊稿考辨》一文，提及拙作《陈东塾先生年谱》数处，至为惭愧！此文初刊于三十年代初期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的《岭南学报》里，迄今已逾半世纪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曾将旧作增订一过，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，我于一九七〇年又修正一回，由澳门于今书屋出版，可能吴、黄先生未曾得看，故说：“《东塾杂俎》这部书，……直到今人汪家衍所编《陈东塾先生年谱》才开始提到它，可能汪氏也未见到原稿吧，所以也只能在谱中说：“殆未编成，故未见传来也。”又说“时人黄荫普编《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》，子部载‘《东塾杂俎》十四卷（敬跻堂丛书），黄荫普藏’”，这是个刊本还是抄本，未有说明。……黄荫普藏，或即据陈氏编录本过录而成的吧。”

黄、吴两先生得见《东塾杂俎》原稿，甚盛甚盛！原稿我确未见过。但拙作《东塾年谱》一三四页已著录《东塾杂俎》十四卷。北京古学院刊《敬跻堂丛书》本。并加以说明云：

“此书为门人廖廷相编辑，尚未成书，稿存先生长孙庆和许。一九四三年癸未，合肥王揖唐囑庆和与绍兴周肇祥校勘付梓。卷一西汉，卷二东汉，卷三晋，卷四南北朝、隋，卷五唐、五代，卷六唐疏，卷七宋，卷八南宋，卷八辽、金、元，卷十明，卷十一国朝，卷十二通论，卷十三余录，卷十四琐记。有揖唐序，肇祥跋。刻成不久，揖唐被逮，书印不多，流传颇少。”此本乃陈庆和以陈澧《东塾杂俎》原稿整理付刊，想吴、黄两先生未见商务印本及一九七〇年《东塾年谱》增订本，更未见王印《敬跻堂丛书》本《东塾杂俎》，故疑黄荫普所藏《东塾杂俎》为抄本，特详为记录如上，敬请贵刊发表于《读者来信》中以供读者研究。

此致

敬礼 汪家衍

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时年七十六